

# 资本主义批判与社会正义

## ——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旨趣

□李 劲

(北京行政学院 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44)

**摘 要:**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制度批判、现代价值观批判以及政治批判上,有着相同的政治哲学立场,这种旨趣使得两种生态政治理论具有一种先在的同源共约性。然而,从产生的自然伦理价值、地理空间和工业化发展程度上看,两者也都带有一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对我们的启示在于生态社会正义不能仅限定在资本主义革命的政治解放意义上,更重要的应该是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命运共同体

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生态危机以及绿色政治运动兴起以后,生态马克思主义内部就“马克思有无生态思想”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以本·阿格尔、詹姆斯·奥康纳等为代表,否定马克思的思想中内蕴着生态思想的因子,认为需要从生态理论视角补充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认为,马克思只是关注了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的实践状况,其在对现代性生存实施批判的基础上,强调生产力、重视物质生产条件,主张只有无限制的工业化才是唯一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的方法。“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sup>[1]</sup>。由此,对马克思及唯物史观提出了诸多指责和诘难,包括“经济决定论”,马克思是“人类中心主义者”“普罗米修斯主义者”“技术决定论者”等等。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戴维·佩珀等为代表,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主要的证据是马克思的一个概念——人类与自然关系中的“新陈代谢断裂”(Metaabolic rift)。尽管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内存在诸多分歧,但在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批判及其政治建构上,却有着共同的演绎路径和价

值诉求。有机马克思主义更是在这个维度上发展了马克思思想与生态视角的兼容性,借助怀特海过程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经济分析理论运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模式(个人主义价值观、资本私有造成的资源不平等、贫富分化以及二元对立的机械思维等),倡导实现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在占有、分配和使用环境资源上的“环境正义”。在制度批判、自然价值观批判以及政治批判上,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有着共同的理论旨趣,这种旨趣使得两种理论具有一种先在的同源共约性,如何看待两者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特性,两种理论的共约性和差异性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如何看待这种差异性,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涉全球性生态危机中需要面对的理论问题。

### 一、资本主义批判、社会正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定位

同源共约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如果是,又是何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

收稿日期:2017-0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KS057);北京市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QNRC201610);中央编译局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李劲(1978-),男,北京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哲学博士,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博士后。

代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抑或“后马克思主义思潮”<sup>①</sup>),这关涉到如何规约和厘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和现实指称的应指与所指。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指称为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学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源于实践性的“改造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现实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政治批判。资本主义是一个劳动、价值、人本身以及社会全面异化的社会,是一个“颠倒”的社会,在这个“颠倒”的世界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正是人类生态危机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人的生存状态在自然物质形态上恶化的体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方面,人的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现实的人总是生存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中,人化自然与人类社会、社会的自然与自然的社会的构成了这个现存的世界。同时,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是这个现存世界的基础和生成动力,通过实践,社会在自然中客观化了自己的目的,使之成为社会的自然;同时,自然又进入社会,主观化地转化为人类社会中的影响因素,使社会成为自然的社会。另一方面,现存世界一经形成又反过来制约甚至决定现实的人及其活动。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劳动及其异化状态,首先就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对物占有关系的改变来改变人对人的关系,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也正是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对自然(物的范畴之内)占有关系的改变来改变人对人的关系,从而实现生态解放和社会正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由原初的宗教批判,经由费尔巴哈的哲学批判,并通过唯物史观建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批判的武器”指向的应该是而且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批判以及意识形态批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失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

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sup>②</sup>。满足这样一种对于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制度及建立其上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的、生态的、文化的、实践的、女权的以及心理的批判等等),在开放的理论学说视野中,都应该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正是从一般性形而上学批判、资本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相统一的价值评价体系出发,来建构各自的资本主义批判与社会正义理论,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在确证的意义上是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其根本不在于其生态学的维度,而在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是“社会正义与人类解放”。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批判的主要路径,“一是估计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所产生的联系不断的空气污染和资源耗竭的环境后果,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同被威胁的生态体系之间的矛盾;二是估计使人变得在情感上依赖于商品的异化消费的现代统治方式”<sup>③</sup>,从而形成了系统的生态观、需要观、消费观、价值观,最终提出了解决现代生态危机的生态政治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莱斯指出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控制自然”观念,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和控制人的工具,它必然会导致自然和人的异化,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科学技术和异化消费<sup>④</sup>。佩珀提出工人运动是社会变革中的关键力量,某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是“非暴力”斗争的一个补充,倡导构建一种以社会公正为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愿景。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没有过时,富裕阶层仍能享受相对健康的环境,而穷人不得不面对越来越恶劣的生态环境<sup>⑤</sup>。奥康纳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生态问题进行了辩护式的说明,指出社会主义和生态学并不必然是互相矛盾的,它们可以是互相补充的。要实现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的联盟,传统社会主义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在实践中,强化对资本主义的定性批判,强调传统的社会主义必须复活社会主义的理念,将社

① 关于这些相关概念的界定和解释,南京大学的一部分学者已经做出,请参阅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下卷)以及胡大平编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等著作。

会主义从分配正义性迷恋转向对生产正义的追求;在政治上,传统的社会主义必须对资本主义国家展开批判,建立起一种能很好地协调好生态问题的地方特色和全球性两方面之间关系的民主政治形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传统的社会主义必须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主义内涵,以保护生态为基本原则进行更高效率的生产<sup>[6]</sup>。福斯特把通过生态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看做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他具体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同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人类摆脱生态危机之路就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逻辑相对抗之路,提出要把工人阶级吸收到生态运动中,促进工人阶级与环保主义者之间的联合。他指出,工人的生存状态及长远利益决定了他们对环境保护是有兴趣的,工人是环境运动必须依靠的阶级力量,生态运动和消除社会不公正的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是一个生态可持续的社会,也是一个公正的社会<sup>[7]97</sup>。

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建设性的新的马克思主义面对了更多的非议和诘难,这也是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所必须面临的解释性难题。国内有些学者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一部分美国学者为迎合中国主流思想而为中国量身打造的一种投机性的生态学说,这种疑猜的根据主要在于创立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学者小约翰·柯布<sup>①</sup>及其学生菲利普·克莱顿、杰伊·迈克丹尼尔等人,为推广他们的生态思想,创办了过程思想研究中心和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该学术共同体主要从过程哲学视野出发看待生态问题等议题,致力于向中国推广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从2007年开始,已经在美国克莱蒙连续举行了九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在与中国学者的国际交流对话中,柯布认为,实现一种生态文明的可能性在中国要大于西方,中国在追求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在融合过程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有着深层次的有机联系。所以,把它们相互移植嫁接、融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确实是可能和可行的——这不仅仅是使其成为一门抽象的哲学,而是

使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生态实践形态。我们把这种相互融合成为一体的整体世界观称作有机马克思主义”<sup>[8]</sup>。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入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域中以后,逐渐生成中的新流派。但这完全不能否定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式的生态政治哲学批判路径和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一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延伸。

克莱顿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2014)——有机马克思主义面世的代表性著作,其副标题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因其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内在缺陷导致如此严重的生态灾难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模式,资本主义“面临它根本无法解决的危机”。因此,资本主义需要替代选择。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正义的抨击体现为三个方面:“资本主义正义‘不正义’;‘自由市场’不自由;穷人将为全球气候遭到破坏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sup>[9]217-219</sup>。有机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仍然令人信服,认为整个地球都与阶级斗争紧密相关,并对资本主义展开了生态批判。具体来看,有机马克思主义有七个核心主张:当务之急是意识到人类现在面临的严峻形势并积极采取措施来解决;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体制的资本主义造成了大量不公和全球环境灾难;真正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是存在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是一种把市场力量限制在追求共同福祉的社会主义共同体范围内的混合体系;全球气候变化将在很多地方导致社会和经济的崩溃;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可能会在这些崩溃的尘埃之中诞生;为了共同福祉,马上行动起来要比等待大难临头之后再行动要好得多。这些主张彰显了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相近或相似的流派。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和社会正义的价值诉求正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在这一点上,它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可以用

① 柯布博士(John B. Cobb, Jr, Ph.D),美国著名过程哲学家,生态经济学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终身教授。主要代表作有《生命的解放》(1990)、《可持续性社会》(1992)、《可持续共同福祉》(1994)、《地球主义对经济主义的挑战》(1999),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

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情怀大声说,有机马克思主义不是仅仅为中国人量身打造的,而是为人类量身打造的。

## 二、后现代主义与生态政治建构的分殊

毫无疑问,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等问题上,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阐释上,二者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区别。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立足于生态学视域来批判技术理性,具有一种相对弱性的生态中心主义的取向。而有机马克思主义更是借助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来建构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结的关系哲学。因而,从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自然伦理价值、地理空间和工业化发展程度上看,两者都是带有一定后现代色彩的马克思主义。

从地理空间的维度和高度发展的工业化程度来看,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都发源于北美,是北美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形态。究其原因,在于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北美在自然资源消耗、消费危机以及文化危机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加之北美实用主义哲学形态的主流影响和潜在消化,促使思想家们从阶级、文明、制度以及马克思主义等各种角度反思生态学运动,力图重建自然与社会、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同时,之所以把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指称为具有一定后现代色彩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归因于后现代的生态世界观力图通过返魅自然的内在价值而重新确立“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及生产方式、价值体系、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立场是一致的。生态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世界观呈现出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现代性实践发展的深刻危机使得人类不得不从人的生态生存的时代需求出发,对现代性文化主导理念展开深层批判和价值反思。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颠覆了现代文化的理性主义、主体主义、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把人从现代性的社会控制之下解放出来。后现代的生态哲学世界观的共识在于:“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人

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生命和自然的存在有其自在的独立性。自然不是人的价值的实现,而是有着内在价值。人在生态世界中生存,自然世界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状况。后现代生态主义世界观提供给人们一种广泛的、整体的世界图景,这个物质性的世界不只是人类认识的对象和现代知识的来源,它更是人类的现实的生存世界。”<sup>[10]</sup>

作为具有后现代色彩和立场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以资本主义批判和现代性价值体系反思为理论辩证法核心,对后工业社会的生态危机以及后现代主义和绿色运动等各种新社会运动的诘难做出了理论上的回应。在一些学者看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以后,出现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思潮并存的理论格局。“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中,在阿多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种否定工业文明以及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一切文化形式的激进思潮出现了。其中的主导力量是借后现代思潮重新建构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Post-modern Marxism),如生态的马克思主义……”<sup>[11]</sup>。

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不同,柯布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在有机哲学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有机结合。其“研究纲领”主要为:在本体论上,反对二元论,主张整体有机论,认为宇宙是一个有机整体,处于流变和相互联系中。在人际关系上,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主张通过倡导“共同体中的自我”来实现人我和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生态主义,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方法论上,反对机械主义,主张有机哲学,推崇高远的整合精神。在文化和宗教问题上,反对文明冲突论,主张多元主义,鼓励对话和协商。在经济问题上,反对新自由主义,倡导共同福祉和绿色GDP,追求一个既是可持续的又是可生活的社会<sup>[12]</sup>。可见,标称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具有一定生态中心主义色彩的绿色范式。

虽然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共同呈现出一定的生态主义取向,呼吁自然价值的返魅,呼唤生态启蒙,但在各自的理论建构上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侧重于通过

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本性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性价值体系展开批判;有机马克思主义则侧重于分析现代性价值体系的特点和后果,分析个人主义价值观与经济主义发展观和生态危机之间的联系”<sup>[13]</sup>。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社会不公和环境退化,主张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比如奥康纳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双重内在矛盾”的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重矛盾,这一矛盾导致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重矛盾,第二重矛盾将导致生产成本上升,造成价值和实现剩余价值的困难。然而资本具有无限扩张追求利润的不竭动力,由于自然资源具有有限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必然结果是对自然资源的越来越多的消耗和对自然界的日益严重的污染,由此必然造成生态危机。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永不安分的社会制度,资本永远不可能停止扩张,否则就无法实现利润。但是地球生态系统是有限的,资本的无限扩张和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之间是矛盾的,“人类按‘唯利是图’的原则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为少数人谋取狭隘机械利益的能力,不可避免地要与自然界发生冲突”<sup>[17]69</sup>。有机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制度并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唯一动因,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虽然促进了生产力进步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但是也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现代性思维方式只承认人的主体性,把其他存在物完全规定为客观性,不存在内在价值,实际上否定了人类之外存在物的福祉,把人类与自然绝对对立起来,导致形成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倾向;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观仅仅考虑经济因素的人类福利,而把人的政治、环境和健康等其他福祉排斥在外。经济主义发展观是以资本为基础,以追求最大利润为核心,在政府政策导向失效和过度的情况下,完全达不到增进穷人利益的效果,反而会导致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不仅如此,经济主义发展观导致对经济和财富的崇拜,物化现象加剧,人的幸福的多样化内容被简化为对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追求,这本质上是人与社会的异化。现代

性价值观念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正义等价值观本质上是立足于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共同体的利益,是无法实现的虚幻的乌托邦。所以,应该拓展自由主义的权力的外延,把个人权利拓展到社会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的权力,才能适应生态危机时代的需要。

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寻求一种通例性的应对生态危机的制度方案,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则重视文化和地域差异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如果必须在某个方面把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相区分的话,那么,有机马克思主义将会应我们的呼吁把文化的特殊性作为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当马克思主义在一种文化中得以有效地具体化,并与人民的实际生活经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时,他才能真正地存在。有机马克思主义——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把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更深层次的道德理念看做这个民族的传统智慧并接纳”<sup>[19]206</sup>。生态马克思主义都反对像西方绿色思潮那样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对立起来,站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角度,坚持用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来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呈现出唯物史观的特质。生态马克思主义否定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危机与人类社会简单画等号的做法,认为人类社会与生态危机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反生态”的,要解决生态危机需要进行绿色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没有异化消费、没有资本逻辑、人与生态和谐共存的生态社会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经济分析,但主张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来补充、修正马克思主义,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要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崇一种注重个体差异的“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此外,有机马克思主义坚持新的研究方法,那就是基于最新的量子力学的科学成果,用有机的、过程的分析方法研究问题。

最后,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带有中国元素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它吸纳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等生态思想,是融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尝试。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西方话语,那么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是东西方共享的话语。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

尽管在理论基础和理论侧重点上不同,但其理论的价值观立场都具有“非西方中心论”的特点,生态马克思主义注重普适性,注重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社会新结构的重构,而有机马克思主义注重多样性,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中国文化情怀,强调解决生态问题的因地制宜性。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具有调和性、开放性、整体关联性的思想特点,在调和性上,把中国古代智慧、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环境思想有机融合;在开放性上,“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新马克思主义”,是使世界免遭资本主义破坏的主要希望所在。其核心原则有四点,即为了共同的福祉、有机的生态思维、关注阶级不平等问题及长远的整体的视野。在整体关联性上,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主义,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和社会的新方法自然地产生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包括天人合一的经典思维方式。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从现代主义的错误假定,不适用于中国文化语境的欧洲特征中解放出来。

### 三、余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生态社会主义的使命

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生态危机以及内在动因往往都是现代性和工业化造成的结果,作为资本主导形式的必然产物,并不回避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尤其是两者同时反映的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历史性后果——理性主义、机械论、二元论和自我中心主义等,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文化发展的普遍主义都说明这是现代社会无法完全避免的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也就是说,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制度体系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但并不是唯一根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解放的意义上,只有生态社会正义的重建才能克服这一缺陷并解放人类的未来,自然的未来以及人自身的未来。而在现代性价值体系逐步解构的意义上,可能人与自然的解放不能只是生态恶化这样一个方面的呈现,即使在后现代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也必将会出现新的不可预知的矛盾性的冲突。所以,格伦德曼虽然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但同时他又强调,不能简单化理解资本主义

必然导致生态危机,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仍然存在环境问题。他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价格制度,价格制定完全由行政命令决定,将资源成本排除在价格体系之外,缺乏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动力,因而也存在严重的生态问题。

生态社会正义不能限定在资本主义革命的政治解放意义上,更重要的应该是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上,在这一点上,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给予人类文明的价值启示估计是更深远的。“生态文明就是将共同福祉置于经济增长之上,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目标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不是经济增长”<sup>[14]</sup>。这需要破除只要制度的变革就能解决社会困顿、自然困境、生态危机、消费主义等各种资本所溢生出的恶果。“纯粹”资本主义和“纯粹”社会主义的制度都不利于生态正义的实现。前者会因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个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膨胀,后者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无法满足人民的根本需求。全世界追求经济增长,不仅无益于幸福提升,而且将导致整个生物圈彻底毁灭,遑论可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联系的丰富性这类共同福祉,远比经济增长重要。生态正义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构建一个生态的世界秩序,万物之间相互联系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是创造性的、富有同情心的、人人可参与的、平等的、生态上智慧的、精神上令人满足的——不落下任何一个人”<sup>[9]186</sup>。

### 参考文献:

- [1]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86.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 [3] 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358.
- [4]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 [5]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 [6]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7]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

- 自然[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 [8] P.克莱顿.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有机教育[J].孟献丽,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1):74-77.
- [9] 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M].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10] 陶火生.自然的返魅路径:伦理拓展、制度变革与资本批判[J].哲学动态,2009(9):86-90.
- [11] 张一兵.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481-482.
- [12] 柯布,樊美筠.现代经济理论的失败: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看全球金融危机——柯布博士访谈录[J].文史哲,2009(2):10-15.
- [13] 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异同[J].哲学动态,2016(1):44-51.
- [14] 小约翰·科布,杨志华,王治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观[J].求是学刊,2016(1):13-19.
- (责任编辑 王玲玲)

##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nd Social Justice: The Political Purport of Ecological Marxism and Organic Marxism

LI Jin

**Abstract**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criticism, the criticism of modern values and political criticism, ecological Marxism and organic Marxism have the same posi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is a kind of purport making both two kinds of eco-political theory have an a priori homologous common consensus, however, with a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of postmoder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nerated value consideration of natural ethics, geographic space and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which the enlightenment available to us is ecological social justice cannot be limited to the sense of political liberation of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but more importantly should be the transformation of value notion in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Key words** ecological Marxism; organic Marxism; eco-justice;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